

哲学、文化与社会

易杰雄 著

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质疑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问题

“统一相对，斗争绝对”含义的再探讨

评苏联哲学界对“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的研究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专题的反思

列宁论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

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真理定义的探索

论创新思维的几个重要特征

必须区分“对抗”与“对抗性矛盾”

论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及其根源

政治家与哲学家

有思想巨人 才有国家富强

为什么“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谨以此文纪念邓小平同志一百周年诞辰

思维特征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

道德中心主义与政治进步

对儒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

博采众长，加速文化现代化

吸取历史教训，把改革推向深入

赫鲁晓夫：功大于过

论中苏（俄）两国改革路线的异同及其根源

C52
14

哲学、文化与社会

易杰雄 著

哲学、文化与社会

R3M76/12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哲学、文化与社会 / 易杰雄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0

ISBN 7-5434-5439-4

I . 哲… II . 易… III . 社会科学—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9557 号

哲学、文化与社会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439-4/C·28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邮购电话: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目 录

哲学、文化与社会(代前言)	(1)
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质疑	(9)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问题	(30)
“统一相对,斗争绝对”含义的再探讨	(50)
评苏联哲学界对“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 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研究	(70)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的沉思	(90)
列宁论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	(107)
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真理定义的探索	(118)
论创新思维的几个重要特征	(128)
必须区分“对抗”与“对抗性矛盾”	(155)
论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及其根源	(161)
政治家与哲学家	(171)
有思想巨人 才有国家富强	(181)
为什么“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93)
——谨以此文纪念邓小平同志一百周年诞辰	
思维特征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	(213)
道德中心主义与政治进步	(232)
对儒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不宜	

估计过高	(251)
博采众长,加速文化现代化	(264)
吸取历史教训,把改革推向深入	(288)
赫鲁晓夫:功大于过	(295)
论中苏(俄)两国改革路线的异同及其根源	(350)
 后 记	(368)

哲学、文化与社会

(代前言)

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人们的衣、食、住等基本的物质需要能获得满足之后，对文化的要求必然会越来越多。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这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同，形成的观念不同，从而作出的决策不同，社会后果就完全不一样这一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上个世纪，同是 70 年代前后的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基本相同，但由于党和政府前后两代主要领导人对时代和形势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因此，作出的决策就不同，并且造成了社会状况的迥异。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搞教条主义，受“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阶段”的传统论断的影响，当时认为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

既然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我们就必须随时作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保卫国家政权的准备。帝国主义经济比我们发达，科学技术水平比我们高，为了一旦反侵略战争爆发我们能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得不把占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加强国防和实行全民皆兵。

既然世界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我们自然就必须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慷慨解囊，尽国际主义义务，支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一部分的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以努力促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本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就很低，人民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把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大一部分支援别的国家，这就势必严重影响本国投资规模的扩大，使经济难以发展。

为了一旦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全国上下能一致对外，这就需要不断“清理阶级队伍”，把地、富、反、坏、右乃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因此造成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加之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普遍不满，由此又误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

既然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主要任务自然就成了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于是，政治运动不断，广大干部和群众被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自然不可能有人真有积极性并能一心一意去抓生产、搞经济。因此，我国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机会，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变得更加落后，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看法上，甚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就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为此在政策上限制、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试图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搞人民公社。因此推行了一条脱离我国生产力实际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的极“左”的路线，严重影响了劳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提高。

邓小平同志成为全党核心后，通过认真总结国内的经验教训，针对以往对马列主义搞教条主义的错误和有人还要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搞两个“凡是”的问题，领导哲学界开展了认识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实践的权威，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引下，通过认真总结世界历史，特别是几十年来两大阵营斗争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是基础这一至理名言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靠搞单向度的政治、军事强国是不能长久的。同时通过冷静观察，敏锐地发觉了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的迹象。于是，抛弃了对时代特征的传统看法，实事求是地明确指出：世界的主题

是和平与发展。

讲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就意味着大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既然如此，就可以建立国际新秩序、裁军、搞缓和。这样，把人力、财力节省下来发展国民经济。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如与美国、苏联等国家改善关系，连续几次大规模地裁减军队，把军事工业中相当大一部分转为民用产品的生产，等等。发展，主要就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为实现战略中心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对待国内主要矛盾上，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决摒弃了原有的“左”的、脱离实际的看法，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再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再也没有必要、再也不能搞政治运动、瞎折腾了。而应把主要任务确定为专心致志搞经济建设。从而为确定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要发展经济，但发现人们普遍缺乏积极性，原来由于过去误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已经成熟到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地步，因此制定了一系列“左”的、脱离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为推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确立的体制。因此，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废除这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如人民公社等，首先就必须实事求是估价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按照对发展阶段的科学认识，建立、健全与其相适应的各种体制，如农村的联产计酬、承包等等，以保证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为此，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现实，认识到，过去认为我国社会主义仿佛已经发展到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地步，这是毫无根据的“左”的看法。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甚至现在还是处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讲到这样一些思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事实还很不够格。“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探索之中”。什么是社会主义，要等我们再搞几十年才能拿出一个比较成型的答案来，等等。并在党的十三大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了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果断地抛弃了以往一切阻碍经济发展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国内,一改过去中央统得过死的情况,为了搞活,对地方,对工、矿、企业、一切生产单位,放权让利;对劳动者个人,为了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通过调整、增加工资,恢复奖金制度,贯彻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容许个体经济有一定发展等,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

既然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需不需要学习、借鉴?外国资本能不能利用?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就必须一改过去闭关锁国的政策,实行对外开放。于是,重新恢复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特区试点开始了。正是由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行了改革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局面。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实事求是地研究,发现市场本身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通过将它与计划经济比较,发现它作为一种调配资源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利用价值。于是提出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并把它作为加速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制度依托;看到自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科学地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为我国能持久地快速发展奠定了路线、政策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十多年,由于领导人观念上的错误,不仅使我国错过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给整个民族造成了大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观念的改变,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使我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这种鲜明的对比再好不过地表明,作为决策的认识、观念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过去,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几百年、上千年才发生一次。因此,先进观念的重大意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大历史作用,文化对社会所具有的决定性反作用,不易引起人们重视。如今,社会发展的节奏越来

越快,重大变革一个接着一个,先进观念、先进文化的决定性反作用几乎成了一组连续不断的链条,它们为清除社会羁绊,教育、发动民众,为社会继续前进指明方向,为保证社会快速发展作出科学的战略决策等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反作用显得特别突出。今天如果还不重视文化,不重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化、哲学、社会科学落后,特别关系到认识论、方法论、世界观、价值观,对问题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研究落后,对我们的基本国情、对作为我们赖以发展的大背景的全球发展趋势、对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对我们自身的需要和能力、对自身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的认识和评价,这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缺乏研究,没有前瞻性,观念陈旧、落后,甚至错误,这样,我们就不可能及时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和得力措施,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就会迅速被人家远远甩在后头,变得更加落后,甚至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引向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首先表现为文化优劣的较量,特别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竞赛。文化、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教导人怎样生活的科学,也是引领社会前进、同时也是推动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力量。

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两翼。知识创新、科学进步是生产力提高、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前提。而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每个人不仅有权决定自己的一切,同时还是与其他人共同组成的社会、国家的主人。民主既是协调、整合社会各阶级利益、使社会保持稳定、作为一个健康的机体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加快自身进步的手段,更是社会每个公民都具有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是每个公民都渴求独立、民主、自由这一目的本身。

民主和科学虽领域不同,但互相依存。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科学。科学技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制约,就会危害社会;而民主不在科学理性指导下进行,不在法律框架内行动,不受道德约束,人人都按自己的需要和意愿行事,就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这样的社会,只能人人自危。老百姓别说作国家的主人了,连自己的基本人权也不可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民主和科学既是观念、价值取向,又涵盖相应的制度。它们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植于相应的文化土壤的。

一些国家之所以民主精神深入人心，并能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证；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直接与其文化传统有关。我们之所以引入了民主共和制，也是徒具其表，之所以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方面在世界上鲜有建树，根源也在我们的文化传统。

因此，要想加速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文化土壤！

而文化的核心与基础又是哲学。所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就是由于作为其核心的哲学不同。因为哲学是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直接关系到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能力的高低。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古希腊已有相当发达的商品交换，政治上实行的是奴隶制民主制，西方哲学的奠基人大都出身于贵族，而且除苏格拉底外，几乎无一不是科学家，他们对数学、天文和物理都有很高的造诣。据说柏拉图学园门口就写有“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亚里士多德更是集西方古代学术之大成，他的生物学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开了西方实验科学的先河。这种情况使他们可以不慑于权威，没有生计之忧，完全从好奇心出发，沉湎于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思辨研究，使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就与自然科学融在一起，想弄清楚天地万物的根源（本体论），具有以求真为目的的知识而知识的特点，崇尚批判创新、有独立见解，重沉思、反思、玄思，使得对思维能力的要求也特别高。西方近代哲学的大师们大多数也同时是自然科学家。如笛卡儿就发明了解析几何，斯宾诺莎对光学有研究；莱布尼茨创立了微分学；洛克对生物学和医学都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培根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康德更是对数学、物理学、地理学与人类学都有研究，他在天文学以及潮汐现象与地球运动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肯定和赞扬。他们转入对认识论的讨论，其实也是为了弄清楚人有没有能力认识世界，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所以，西方典籍中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方面的著作极多。欧洲近代哲学家们高扬人的理性，特别是自然科学理性，进一步提高了人的思维能力，推动了知识的分化过程。这也是西方科学技术能飞速进步，在全世界率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原因。而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中国哲学的奠基者大多为士人出身，很少有家境非常

殷实的。孔子少贱,庄周家贫。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要靠为统治者服务维持生计。故“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因此,中国哲学家一开始就以探究道德政治为主,研究的主要是修身治国之道。这样的哲学在价值取向上必然以权力为本位,提倡“学而优则仕”,从而重世用而不重玄想,对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少有兴趣。而过于强调世用,则不仅通过想了又想——沉思、反思、玄思追求那些表面上远离现实的纯粹知识之风难以形成,纯粹科学的兴起也就势必为时势所不容。中国哲学的奠基者们不仅很少自己本人也是科学家的,而且他们从来不关心、甚至瞧不起自然科学。要想学以致用,首先就必须有学。虽然近代以来,提倡学以致用时,提倡的学以致用之学也包括自然科学,但由于太过强调用,使得中国哲学缺乏深厚的根基,结果必然是既无学也无用,或把哲学等同于一般的伦理道德、政治或社会学。而西方一向强调学,强调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进入近代之后培根等人又强调用,强调科学与工业结婚。所以,他们不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多,这些发明创造被应用于实践后社会发展也快。中国由于对科学缺乏强烈的向往,对民主的渴求也就少了一个根基。

中国要想科学有很大发展,就必须使民主得到充分的发扬。因为科学创新这种精神性劳作,只有在愉悦的心情下进行才有可能取得成果;也因为科学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和挫折要远远多于最终的成果,不许失败和挫折就是不许创新,没有宽容就不会有知识探索的成果;加之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平等的讨论和争论也是科技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之一。此外,中国要想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就必须改变对纯粹知识、对最思辩的哲学缺乏兴趣的毛病,改造社会文化土壤首先必须改造我们的哲学思维!

遗憾的是至今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喜欢思辩哲学、认识到没有扎实的哲学根底是很难在科学方面作出像样的贡献的人还太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与领导人在工作指导上搞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有没有关系?而且又与在我国长期流行的,作为指导思想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本来是一个必须从世界观高

度全面、系统认真加以总结的问题，可惜我们并没有下大力量去做。

近代以来我们所以越来越落后，原因何在？与我们两千多年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先进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建设？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很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质疑

长期流行的哲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绝大多数是这样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或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概括科学吗？如果这种表述不科学，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怎样概括才符合实际，才科学呢？

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更没有说过他们创立的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虽然一再单独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并且分别用它们中的一个表征过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也从来没有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这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我们就不能讲，更不等于他们没有讲的我们讲了就一定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他们

所以不这么讲,是由于这种表述不科学,不能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个有机整体。用列宁的话说,它是“一块整钢”。可现在这种表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它的结构成了各自独立的两部分,这就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破坏了它的整体性。

毋庸讳言,列宁虽然从来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他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在简略叙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时,又的确有过这样的框架:先介绍“哲学唯物主义”,接着讲“辩证法”,然后讲“唯物主义历史观”。特别是他写作《卡尔·马克思》一文的提纲,这种框架更明显。不过我认为,列宁当时还很难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已经有了很好的把握,因为事实表明,列宁确曾有过写一本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的动机,但他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去着手完成它,而是于写完这一词条后接着就集中精力开始潜心研究哲学;甚至直到他逝世前都未忘记要做这件事,并且同样认为尚未研究好,着手写的条件尚不成熟;而且从他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看,并没有狭义的认识论的内容,却专门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特别是还把“阶级斗争”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等并列地作了介绍。很显然,他所着重介绍的是马克思在哲学上最主要的独创性的东西和当时社会历史提到首位的东西。因此把他在这里对新世界观的介绍看作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和完整内容的严格、准确表述的依据是不对的。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一种自然哲学,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哲学,是社会学的一部分。事实上,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在解释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时就是这样讲的。这样,统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表现为两个对象、两个科学,成了两种理论、两种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理解,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在科学意义上理解的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作为自己

的认识论——亦即整个哲学的基石,为此他们还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把一切在社会实践之外、与社会实践无关、超人类的“自在自为的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可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知识成为都是可以通过实践检验的真正科学知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彻底区别开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谈论自然时,从来就不是简单地、自然主义地把它看作是超社会的、史前的范畴,没有也不可能把它看作是脱离人和社会,与人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和实践改造的历史的抽象概念。当然,这绝对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实践以外的自然的存在,相反,它认为打上了人类实践烙印的自然界是自然界很小的一部分。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实践打交道的自然,人认识到的自然正在逐步扩大。所以,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认识和思维的共有的规律的科学学说。事实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来没有信仰过称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那种唯物主义,而且尖锐地批判过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广义的历史哲学之外还有所谓的自然哲学,这恰恰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所竭力反对的东西硬按到他们的头上。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它们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并列起来,给人一种错觉:仿佛辩证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又是非辩证的。前面已经讲过,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是关于现实的运动的规律与本质的学说。因此,它不可能是非历史的。列宁曾讲,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要由哲学史、各门科学的历史、整个认识的历史等等来构成,由这些历史构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当然不可能是非历史的。同样,不辩证地分析社会生活,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幻想。对此恩格斯就明确说过:“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特别应用,只有借助辩证法才有可能。”^①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77~37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证唯物主义在前,历史唯物主义在后,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仿佛就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现象领域的“扩张”。这样的论断在哲学文献中也一再出现过。如列宁讲:“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①“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应用于社会现象的领域。”^②斯大林在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也是这样讲的。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也是这样讲的。可是,要这种说法成立,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能够不依赖于历史唯物主义(狭义的)而产生和存在为前提。但这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是在研究现实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发现了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辩证(同时也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一点,从分析恩格斯在通过社会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进一步研究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并创作《自然辩证法》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所以要这么做,就是打算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他那个时代的全部自然科学进行哲学概括,打算通过《自然辩证法》来证明唯物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即这些规律不仅表现在人类生活(社会和思维)中,而且也表现在自然界中,从而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奠定自然科学基础,使之与《资本论》相衔接,与《资本论》一起提供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统一而完整的观念,对从非生物界最简单的物质运动形式起,直到揭示人类社会运动前景为止的,包括全部客观实在的整个发展过程,作出统一而完整的说明。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在现实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个超时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存在,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当然也就只能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简单拼凑了。因为费尔巴哈并不懂得社会实践对人的认识的意义,他的唯物主义不过是讲认识是人对外在世界的消极直观。所以,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受历史影响的。而黑格尔赖以建立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同上,第425页。